

# 财政收入看增速更要看效能

曾金华

## 深度观察

今年以来,财政收入的高增速一直颇为抢眼。最新统计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13.7万亿元,同比增长20%。高增速是否就能够“高枕无忧”?实际上,“20%”的背后,有着财政运行的一系列特殊性和困难挑战。

财政收入是经济的晴雨表,高增速的基础在于当前经济的持续稳定恢复。从作为财政收入主体的税收具体分析,更可说明问题。比如,作为重要税种的国内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增速都在两成左右,主要原因是工业和服务业恢复良好,企业利润持续稳定增长;进口环节税收增长强劲,则来自一般贸易进口持续增长。正是由于财力保持增长,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

财政收入高增速是否意味着“手头”宽松了、收支矛盾缓解了?并非如此。

首先,要客观看待今年同比增幅的特殊

最新统计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高达20%,但财政收支并非“高枕无忧”。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按照中央“提升政策效能”的要求,从收入和支出两端发力,助力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组织财政收入要强化依法依,注重“放水养鱼”,实现税收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性。今年前几个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速较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去年同期受疫情影响导致收入基数较低。实际上,今年前7个月财政收入同2019年同期相比,增幅为9.6%。把20%和9.6%放在一块看,更能理解当前财政收入的状况。从下半年情况看,由于去年下半年基数抬高,再加上一些新的减税政策在今年下半年发挥效应,预计全国收入增幅会明显回落。

其次,收支矛盾依然较为突出,紧平衡状态未变。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严

重冲击,各领域资金需求加大、“等米下锅”,财政支出增长刚性较强,收支形势比较严峻。虽然财政收入增速高于支出增速,但从规模上支出大于收入,仍需要通过赤字来弥补。同时,面对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特别是疫情反复,需要为应对新的风险挑战留出政策、资金空间。

再次,虽然各地财政收入普遍回升,但地区间收入分化格局延续。统计显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财政收入增速差别不小,东部地区收入保持较高的增速,东

北地区收入恢复较慢,有的省份收入和2019年同期相比甚至下降。区域间财力不平衡问题,尤其是经济较落后地区的基层“三保”、债务风险等,应引起高度重视。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增速高达20%,财政收支并非“高枕无忧”。作为宏观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按照中央“提升政策效能”的要求,从收入和支出两端发力,助力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特别是做好跨周期调节和前瞻性调控,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力度,提高支出效率和资金使用绩效,管好用好直达资金,更好发挥惠企利民实效。

值得强调的是,当前市场主体仍然较为困难,需要大力纾困解难。组织财政收入要强化依法依,注重“放水养鱼”,实现税收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特别是要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减税降费政策,使市场主体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坚决不收“过头税费”,真正让市场主体轻装上阵。

# 健康保险有待迈过多道坎

江帆

在保险业最新交出的上半年成绩单中,一个现象值得关注。上半年,虽然健康保险同比增长依旧是在人身险里增长最快的,增速达到7.9%,但遗憾的是,健康保险此前保持了多年两位数增长,今年陡然减速。数据显示,去年和前年同期的健康保险增速分别是19.72%和31.70%。

人们对健康保险的需求,显然还未达到饱和。2020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并发布的《关于促进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发展的意见》,提出力争到2025年健康险市场规模超过2万亿元。然而,2020年我国健康保险规模仅为8173亿元,离相关目标尚有不小距离。另外,从近年来各地“惠民保”掀起的投保热潮来看,人们对健康保险仍存在巨大需求。

今年上半年,健康保险数据呈现的另一个趋势也非常值得关注,那就是健康险的保费收入与健康险理赔支出在同比增长方面形成明显反差。数据显示,上半年健康保险理赔支出同比增长70.82%,比同期健康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速高出了62.92个百分点。

这种情况是偶然发生的?还是会持续影响?仍有待观察。不过,两个方面的情况较为明朗,其一是健康保险理赔量提升,说明健康保险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必备保障,特别是“惠民保”的普及,大大扩展了健康保险的覆盖面。其二是健康险的获利空间正在被逐步压缩,如何找到健康险保费收入与理赔支出的平衡点,是所有经营健康险的保险机构亟待解决的问题。

健康保险将随着医疗技术发展,不断增加服务范围、持续升级需求。从长远看,保费收入和理赔支出的同比增长倒挂不可持续。保险机构要想保持住市场优势,就必须不断创新,尤其需要科技赋能。比如,要更注重健康保障中的前端投入,在“治未病”的健康管理领域下功夫,通过电子手环、智能手机等移动电子技术汇集大数据,管理好客户健康信息。科技手段可以帮助保险机构了解和掌握影响人群健康走向的因素,协助降低发病率和理赔率,最终在健康保险经营效率和效益之间找到合理匹配度。

这就需要保险行业加速向精细化管理转型,摒弃单纯追求数量和承保规模,告别在承保中相互压价的那种跑马圈地式竞争,尽快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时至今日,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不能仅仅依靠保险业中任何一方。与社保融合速度的加快,在赋予商业健康保险更多责任的同时,也带来了某些问题。其中之一是,社保和医疗机构的大数据还未实现与保险机构的全面共享,这给健康保险的理赔,尤其是杜绝投保中的道德逆选择,带来了很大挑战。因此,如何安全有效地建立商保社保的健康医疗数据共享,对提高全社会的健康保险效率、降低理赔率有重要意义。在有关制度设计指导下,各方面须积极开展跨部门跨行业合作。

## 减轻家庭生育负担

(时 锋)

近期,湖南省下发有关通知,明确将参保女职工生育三孩的费用纳入生育保险待遇支付范围,按规定及时、足额给付生育医疗费用和落实生育津贴待遇。近日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明确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随着相关政策逐步落地,各地有效加强生育服务工作,育龄群体的生育顾虑有所减轻,有关生育政策将得到更好实施。



王 鹏作(新华社发)

# 外卖打包费不能成「赚钱套路」

江德斌

近年来,外卖服务便利了百姓生活,也有许多不足有待改善。其中,打包费过高是消费者反映集中却迟迟未得到解决的一个问题。消费者点的是外卖,却为包装费付出了额外费用,本就令人不愉快。特别是部分打包费收取比例竟超过10%,还存在强制收费、花样复杂等问题,更加令人难以接受。

外卖是店外销售服务,打包餐食本来是常规操作。按照正常流程,外卖打包需要提供餐盒、塑料袋等必需品,至于一次性餐具、湿纸巾等则属于额外选项,应由消费者自行选择搭配,并在知情前提下另外付费。还要看到,店家大批量采购外卖餐盒、塑料袋等,属于批发价、工厂价,成本比零售价格低很多。在正常情况下,店家在提供打包服务时只应收取打包成本费用,不能将打包费定得过高,更要警惕将其异化为一种“赚钱套路”。

然而,店家往往将包装费定得远高于批量购买的成本。一般情况下,单个外卖包装的费用多为1元至2元,但消费者在有的店铺购买同样的外卖,打包费却会莫名其妙地涨价。还有的店家会将同一批外卖分开装袋,能收一份打包费的情况偏要打包成两份,甚至每一个单品都单独包装。某些店铺连赠品也要收包装费,包装费甚至比赠品的价值还要高。显然,部分店家已经把打包费当成了赚钱工具,认为多收一份打包费就多赚一笔钱。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与平台的高比例抽成不无关系。商家每卖出一单,外卖平台要抽成相应比例,店铺赚的钱少又不敢在菜品上加价,只能增加包装费了。可见,平台与店铺的利益分配模式有待优化,不能使得商家通过玩弄打包费的套路,让消费者变相承担了有关成本。

除了要促进平台降低抽成比例,给店家留下合理的利润空间,店家还应将打包选择权交给消费者,由消费者自主决定是否打包、打几个包,是否另外选购一次性餐具、湿纸巾等。同时,店家还要遵守环保节约精神,尽可能减少打包量,降低资源消耗。

# 乡村振兴需选优配强镇村干部

武义泉

中央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提出,坚持把乡村人才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大力培养本土人才,引导城市人才下乡,推动专业人才服务乡村,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乡村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镇村干部在基层一线工作,是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最后一公里”的组织保障。乡村振兴是一篇大文章,需要各类人才来书写,其中建设过硬的镇村两级干部队伍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为此,要不断向乡镇注入优质“活水”,选优配强乡镇干部队伍。优先考虑长期在乡镇工作、政治素质好、业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担任乡镇工作重要岗位。同时,有计划地从县级以上机关选派能力突出的年轻干部到乡镇任职挂职,多渠道建立党政干部下乡任职、挂职、帮村的长效机制。坚持按编制名额及时补充人员,招录一

定数量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动态充实、优化干部结构。此外,还应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倾斜。

同时,要采取下派、外引、内育等方式选优农村带头人,净化、优化村干部队伍。一方面,从村里选拔思想政治素质好、道德品行好、致富能力强、协调能力强的党员担任村“两委”主要负责人,发挥好村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另一方面,摒弃论资排辈等陈旧观念,注重从农村致富带头人等群体中选拔村干部,或将乡贤、离退休老干部等聘为“名誉村长”。与此同时,重点建立面向贫困村、软弱涣散村和集体经济薄弱村选派第一书记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驻村工作队作用等。

还要进一步完善政策举措、加大投入保障、强化责任落实,激励基层干部干事创业。一是因地制宜拿出“政策干货”,深化乡村人才培养、引进、管理、使用、流动、激励等制度改革,拓宽基层干部发展空间。优先重用干出成绩、群众认可的干部,并完善有关激励措施。二是要善于“铺路子”“给位子”,谋划各类农村创新创业基地(园区)和重大项目,为基层干部搭建适宜的依托平台,用事业激发人才活力。三是推动政府、培训机构、企业等共同参与人才培养,围绕集体经济和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加强教育培训。四是改善工作生活条件,帮助基层干部及其家属解决实际困难。

# 为乡村青年“返乡”创造条件

浦天龙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返乡人员是一支重要力量。近年来,不少返乡青年顺应趋势,由外出务工转为返乡入乡创新创业。据统计,2020年我国各类返乡入乡创新创业人员达1010万人。

然而,由于城市有较多的资源,多数青年依然选择在城市就业创业,返乡入乡创新创业仍需要更多鼓励举措。

一是以城乡融合发展为青年“返乡”创造便捷生活条件。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乡村青年,关注就业、教育和医疗等,会较多考虑农村生活条件能否满足其在城市

中已形成的生活模式。随着乡村在水利、电力、道路交通、互联网等基础设施方面与城市的差距逐步缩小,“留得住人”的乡村生活应有所深化和拓展。进一步促进城乡要素合理配置,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让青年返乡后,在日常生活、子女教育、卫生健康、公共服务等领域获得相应的保障,有利于稳定青年扎根乡村创新创业。

二是以统筹产业布局为青年“返乡”打造产业基础。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也是地区、城乡统筹发展的基础,只有整体布局明确,区域特色突出,产业定位合理,青年返乡创新创业才可能做到目标清晰、判断准确。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各地应为本地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规划,以农业合作社、土地流转等组织制度为基础,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培育产品产业优势,在农产品加工业、工艺品产业、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农产品流通与电子商务、生产资料供应服务等方面寻求发展机遇。

三是以社会治理改善为青年“返乡”营

造和谐社区氛围。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法治化和智能化水平,运用基层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民主、社会组织参与、乡贤参事、村规民约、文化道德滋养等改善乡村社会生态,运用法治来保障社会秩序,利用互联网加强智慧党建、智慧法庭、网上调解、网络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使各地乡村成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和谐社区。

四是以乡村文化建设为青年“返乡”营造良好人文环境。乡村文化建设,意味着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吸收和接纳,并以现代化的形式呈现和表达传统,特别是涉及乡村规划设计、乡村旅游、农产品品牌化等领域,听取青年意见、吸收青年参与,为青年感受乡风、建设乡风、传承乡风创造条件,让青年通过文化建设的感知和参与,浸润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精华,理解自然与社会,指导自身行为,并通过文化建设,推动乡村旅游、乡村民居、乡村生态等领域建设的价值提升,形成良好人文环境,真正实现乡风文明。